

## 访谈录

← (上接7版)

不是完整的人。对社会而言,我们是“女人”,它与“人”是有点对立的范畴。10岁的我领悟出这条结论,我非常确信,我要最大程度地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我要避开做抉择,相信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我会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您到瓦萨学院就读,当年瓦萨学院面对并入耶鲁大学的邀请,并没有同意,而是坚持开放男女同校。

莎伦·安·霍尔特:瓦萨实行男女同校就是对耶鲁的回应。在年度舞会等社交场合,男子学院通常与女子学院搭配,耶鲁大学的男生一直是瓦萨学院女学生的舞伴。每次舞会前,瓦萨学院的女学生从波基普西市乘车去纽黑文,一排耶鲁的男生站在一片空地上,审视每一位下车的女生。这一点都不浪漫,甚至有一点残忍。我们不想失去美丽的校园,拒绝合并。在大家强烈的反对声中,瓦萨最终拒绝了耶鲁合校的邀请。

回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史学职业化早期阶段,以历史学为职业的女性很不受待见,这并非孤例。记得贝蒂·弗里丹曾讲过一个故事,哈佛曾拒绝一位女性的求职,理由是她打算结婚生子。直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对职业女性的排斥依然存在。职业化早期对女性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

又对后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莎伦·安·霍尔特:19世纪末的医学经验声称,如果女性过度思考开发大脑,她们卵巢就会停止工作,子宫也会收缩。因此,像露西·梅纳德·萨蒙(Lucy Maynard Salmon),或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等年轻女孩告诉父母自己想要上学时,家人通常会拒绝她们,因为这将终结家族的延续。为反驳这种理论,自1864年起,包括瓦萨学院在内的所有新式女子学院都规定,从学生入学到毕业这四年间,都须接受体能测试。女学生每天早晨做操、跑圈,以保持身体健康。等到她们学成毕业,校方一再强调她们具有生育能力,可以做母亲,从而证明当时的医学理论是错误的。因此,在19世纪末,女性的求学环境非常艰难。

当时学术组织和医学知识非常敌视受过教育的女性,这导致一些女子学院走向另一个极端。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毗邻费城,也是一所精英女子学院,我曾在那教了4年书。自学院建立起,每年年底都举办滚铁环比赛,由高年级的女学生参加。这个游戏起源于19世纪,非常有趣。参赛者竞相跑过校园中央的草坪,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女生,将成为这一届中最先拿到博士学位的人;第二个则最有可能先结婚。这又是一个心智与心灵的选择,在这里,结婚即意味着失败。这样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你有做学术的雄心

壮志,你就必须放弃所有个人生活的希望。

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都知道,在美国革命修辞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论及女性和女性教育时,人们倡导:“我们要教育好妇女,因为她们将会成为下一代男性公民的母亲。她们应该准备好培养聪明的儿子。”教育女性就是为了让她们培养优秀的儿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又重拾这一观念:我们美国现在是世界强国,我们需要培养杰出的领袖。我们怎么培养领袖?教育母亲们!二百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没有太大变化。

### 美国史学界的性别歧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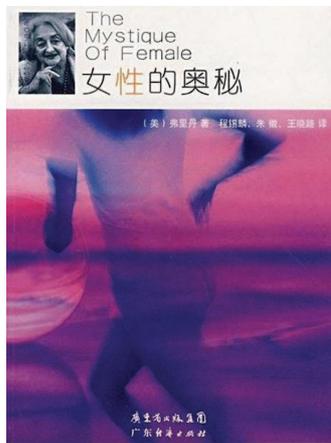
从专业人才培养和组织制度等方面来看,美国史学职业化早期具有鲜明的“男性化”特点。例如美国第一位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是凯特·埃佛斯特·李维(Kate Everest Levi),1893年她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特纳主要选取男性感兴趣的主题和方法培养博士生。露西·梅纳德·萨蒙是创建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她的学位论文主题是美国总统制度,这完全是一个男性化的研究成果。早期研讨班主要设在教授家的书房,这是男性的社交场所,不欢迎女性进入。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莎伦·安·霍尔特:女性所面对的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劣势,而是多种劣势的组合。

在职业化早期,所有的职业发展都围绕男性展开。比如说,任何女性不能让别人质疑她的美德,因为若有失体面,她们就无法从事任何职业。在没有男性家属陪同并给予支持的情况下,任何女性都无法从事专业研究。

但是,历史学本身存在更大的问题。在20世纪中期以前,历史学固守政治和军事领域,直到六七十年代情况才有所改变。因此,那些想成为历史学家的女性不得不忽略她们的个人经历,接受人们对她们生活的界定,即她们的生活与历史研究无关,一旦将历史定义为“除去女性之外人类的经历”,她们的个人价值便不值一提。女性的经历不重要,研究女性也难以受人尊敬。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者克服了重重阻碍才改善了这种状况。

1991年我写完了博士论文,并在2000年出版。论文主题



“Putting Husband Through, Ph.D.”(让丈夫完成学业)出自《女性的奥秘》,是弗里丹仿照 Ph.D.(哲学博士学位)讲的一句玩笑话。(参见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朱徽、王晓路译)

是在奴隶制废除后半个世纪中,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经历。在这期间,她们建造了学校和教堂,获得了土地,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为20世纪非洲裔美国人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我论文的第一个评阅人说:“我觉得这个作者谈不上是个历史学家,她关注太多细枝末节。”大概9年后,另一位评阅人的意见是:“这位历史学家不熟悉家庭经济文献。”在这9年间,仍有人认为女性(尤其是非洲裔女性)的活动微不足道,人们也不鼓励女性学者把她的见识、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经验,与她的学术研究联系起来。与之相对,人们却鼓励男性学者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经验转化到学术研究之中。

女性为争取权益开展活动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男女差别对待,而这些讨论很少涉及女性内部的歧视,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莎伦·安·霍尔特:我刚才提到了布林·莫尔学院的故事,那里的女学生主动把心智和心灵分开,学院鼓励她们在毕业后继续相信这种叙事。我的导师就是布林·莫尔学院1968届毕业生。我认为,世间所有为自己的人权努力奋斗的群体,都会经历前一代的成功者转变为后一代的敌人的阶段。每扇门之前都有人守候,他们把门关上并锁起来,这不过是人类的秉性。在美国女性运动中,有过太多先例。在我看来,尽管职业歧视确实存在,但种族和性别歧视才是最重要的。美国社会转变一直相当保守,我们的领导群体大部分是有特权的白人。我这一代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主义者,实际上把非洲裔美国女性主义者和女同女性主义者拒之门外,这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和损失。我们担心一次性索要的太多,会让整个运动功亏一篑。因此,有时前一代开拓者转而会反对下一代人的

进取精神。

### “我们反对研究‘女性’这一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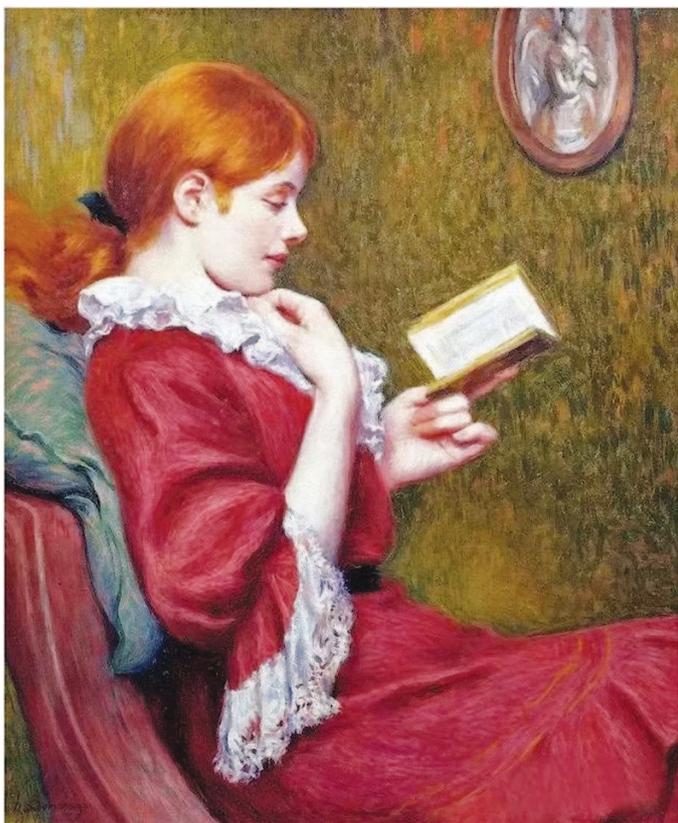
这也反映出在20世纪80年代,学校和社会对已婚生育女性的制度和政策性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在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逐渐获得一些福利,如托儿所和产假等。在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遇到过这方面的困扰或有利待遇吗?

莎伦·安·霍尔特:我嫁给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所以问题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我们可以自由掌控时间,每人每周各上两天课,一个人去学校教课,另一个人就在家看孩子。我有一个朋友在布林·莫尔学院任教,并获得终生教职。在她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人告诫她不要跟学院提这件事,也不要任何情况下要求暂停试用期。她只要开口提这种要求,学校就对她产生偏见,并终止试用期。即便这违反劳工法,但无人能够证明这一点。

我和这个朋友都有两个孩子,并尽我们所能过好自己的生活。我们过去常常和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讨论,反思在写论文期间怀孕生子是否明智。当然,女性或许应该在写完论文、找到一份工作后再生子,但紧接着她们还得为终身教职奋斗,适当的时机似乎从来都不存在。如果想等到获得终身教职再要孩子,她可能就已经错过了生育的最佳年龄。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父母都需要一些喘息的余地来照顾孩子,那么事情就变成“人们有孩子”而非“女人有孩子”。这是非常值得奋斗的事情。例如,我们不仅仅为了妇女的育儿假,而是为父母双方的育儿假而战。这与我们从“女性研究”转变为“性别研究”是一

(下转9版) →



在美国革命修辞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论及女性和女性教育时,人们倡导:“我们要教育好妇女,因为她们将会成为下一代男性公民的母亲。她们应该准备好培养聪明的儿子。”二百年过去了,观念没有太大变化。